

三國志六十五卷

(晉)陳壽撰

(南朝宋)裴松之注 元大德十年(一三

〇六)池州路儒學刻本。框高二十二釐米，寬十六·六釐米。每半葉十行，行二十二或二十三字，小字雙行同，白口，四周雙邊。

由中國國家圖書館與上海圖書館配成六卷(中國國家圖書館：卷十五至十九；上海圖書館：卷四十三)。

陳壽(二三三—二九七)字承祚，巴西安漢(今四川南充)人。據《晉書·陳壽傳》記載：陳壽「少好學，師事同郡譙周，仕蜀為觀閣令史。宦人黃皓專弄威權，大臣皆曲意附之，惟陳壽不為之屈，由是屢被譴黜」。入晉後，歷任佐著作郎、著作郎、治書御史等職。著有《三國志》六十五卷、《益都耆舊傳》十篇、《古國志》五十篇，編《諸葛亮集》二十四篇等，但僅《三國志》流傳至今。《晉書》、《華陽國志》有傳。

《三國志》記載魏、蜀、吳三國鼎立時期史事，分《魏書》三十卷、《蜀書》十五卷、《吳書》二十卷三部分，記載從董卓之亂，到晉武帝太康元年(二八〇)九十年的歷史。與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、《後漢書》合稱「前四史」，在中國史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。

據《華陽國志》等記載，陳壽約於晉武帝太康元年（二八〇）始編《三國志》，歷時十餘年完成。此前已有二十餘種三國史書，如晉王沈的《魏書》四十八卷、魏魚豢《魏略》五十卷、吳韋昭《吳書》五十五卷、蜀王崇的《蜀書》、晉譙周的《蜀本紀》等。陳壽參照時人所編著的三國史和三國史官注記，著成《蜀志》、《魏志》、《吳志》。

《三國志》屬私家修史，陳壽死後，梁州大中正尚書郎范頽等上表稱：「故治書侍御史陳壽，作《三國志》，辭多勸誡，明乎得失，有益風化。雖文豔不如相如，而質直過之，願垂採錄。」（見於《晉書·陳壽傳》）於是朝廷派人到陳壽家抄寫此書，藏入祕府。

關於《三國志》的成書，學界有不同意見：

一是《三國志》分為魏、蜀、吳三書，本是各自為書，分行於世。此問題發端於一九五九年中華書局標點本《三國志》。而《舊唐書·經籍志》則以《魏書》入正史類，《蜀書》、《吳書》入編年類，這表明三書在宋以前曾各自獨立流傳。但這祇能表明《三國志》曾經分行，卻無法斷定這種分行是陳壽的本意。

二是繆鉞在其《「三國志」的書名並非始於北宋》中引證史實，證明西晉至唐初，

已稱陳壽之書為《三國志》，而不是三書分行。

北宋真宗時，《三國志》雕版行世已將三志合為一書刊行了。

南朝宋文帝不滿《三國志》過於簡略，令裴松之廣採三國時期的各類史籍為之作注。裴松之受詔後，三年精心製作，於元嘉六年（四二九）注成奏上，為文帝稱讚。

裴松之（三七二—四五—）字世期，南朝宋河東聞喜（今屬山西）人。少為殿中將軍，宋初歷太子洗馬、中書侍郎，後出為永嘉太守，勤恤百姓。轉遷至國子博士，進太中大夫。除《三國志注》外，還著有《晉紀》、《裴氏家傳》、《宋元嘉起居錄》等。另有文集十三卷。元嘉末年，他曾經受命修本朝歷史，但未及完成而辭世。

裴注的重點不是訓釋文義和名物制度、地理沿革，而是增補缺漏和糾正謬誤。裴注字數與陳志相當，援引各家史著二百多種，將《三國志》不載而有保存價值的史料以注的形式加以補充。其引用的書籍收入《隋書·經籍志》的還不足四分之三，到唐宋以後則十不存一。裴注徵引的材料首尾完整，其史料價值不言而喻。裴松之在《上三國志注表》中，將自己注文概括為補缺、備異、懲妄、論辯四種類型。重點是補缺，亦進行

史學評議，考辨史事，對三國時史書加以評議，對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提出看法，不僅有史學，也有史識。開創了注史的新體例，在中國史學史上，裴松之《三國志注》佔有特殊的地位。

《三國志》最初以寫本流傳，現在仍可見到寫本殘卷，北宋以後，以刻本為主，現存宋刻有十行本、十三行本、宋刻遞修公文紙印本、宋刻元明遞修本、宋衢州刻元明遞修本等。還有原陸心源皕宋樓藏本，後至日本靜嘉堂文庫，原定為北宋咸平間刻單行本吳志二十卷，後經學者鑒定為南宋初年刻本。

此本《三國志》為元池州路儒學刻本，大德九路儒學十七史之一。大德九年（一三五〇）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司副使伯都，以經史為學校之本，不可一日無之，版籍散在四方，學者病焉為由，倡刻十七史，大德九年兩《漢書》成，十年《三國志》成。

中國國家圖書館存五卷配以上海圖書館藏一卷，雖仍為殘書，但使我們可得窺見元九路儒學本之面貌。國家圖書館本原藏內閣大庫，包背裝。（陳紅彥）

